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否定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形象推翻了;勃涅日列夫再把赫鲁晓夫翻过来,最后,戈尔巴乔夫干脆来个全面否定。在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批评无禁区”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口号鼓励下,被压制已久的苏联报刊和社会舆论开始了对苏联历史和苏共历史报复性的揭露和批判,公共领域中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辩论很快汇成了强大的否定性的颠覆苏联制度的强大洪流,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与实践被描绘成一场“罪恶”的历史与“罪恶”的实践,苏共历史也被说成一团漆黑,不明真相的群众被狂热的社会舆论所引导,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成灾。<sup>①</sup>以至苏联史学家痛心指出“恢复历史真相”成了随心所欲地演绎苏联 70 年的背面。彻底地、一年一年地加以毁坏,到处只挑选黑暗的、阴森森的、悲惨的东西,到处只看到停滞、暴力、劳改营。这是多么努力地在填补历史的“空白点”,以致都没有觉察到,如何在一个美妙的瞬间,不仅历史没有了“空白点”,“连历史本身也不存在了”。<sup>②</sup>这样朝令夕改,昨天还在报纸和电视上大吹特吹的中央指示,今天便成了罪恶的渊薮;刚才还是人民伟大领袖的人物,转眼间便被打成人民公敌。如此的倒行逆施让广大苏联人民无所适从。

苏联剧变的终极原因是苏共自毁长城,成为孤家寡人。苏共历来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重视知识分子的工作,加强军队现代化。但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民控制得太苦,农业发展长期落后,农业集体化没有适应农民发展的需求和心理;对知识分子干预太多,经常混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在苏联剧变中,凡是在居民文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共产党失败得越惨重;对企业统得太死,管得太细,工人没有积极性。戈尔巴乔夫搞军队国家化,放弃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导致军队的失控和军人的不满,加上苏共的腐化,使苏共越来越孤立。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可以说是各个阶层都不满意,甚至苏共党内的干部也不满意,社会浮躁、人心涣散、怨声载道,苏共的形象、威望和动员力急转直下,国内外反对势力也乘机兴风作浪,使苏共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国家的分崩离析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了。<sup>③</sup>

## 制度供给过剩与苏联政治的衰朽<sup>\*</sup>

郝宇青

(华东师范大学 政治学系,上海 200241)

所谓制度供给过剩,是指相对于社会对于制度的需求而言,有些制度是多余的,或者一些过时甚至是无效的制度仍然发挥作用。十分明显的是,苏联是一个高度集权和政府管制较多的国家,制度供给过剩成为其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虽然在苏联历史上也曾有过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但是,制度供给过剩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而制度供给过剩则使得苏联的政治生态恶化,导致了其政治的衰朽,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里,笔者试图探寻苏联制度供给过剩的表现及其所造成的政治后果,以就教于方家。

### 一、苏联制度供给过剩的表现

苏联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度里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弥合共产主义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迅速实现现代化就成为苏联政治的内在要求。而为了迅速实现现代化,则需要

① 曹长盛《苏联解体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及其教训》,《山东社会科学》2011 年第 7 期。

② 博尔久科夫、利兹洛夫《史学与时期》,莫斯科 1992 年版,第 3-4 页。

③ 黄宗良、肖枫等《热话题与冷思考——关于苏联剧变 20 周年若干问题的对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 年第 4 期。

\* 基金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苏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研究(2007FZZ001)。

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配合。苏联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通常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毫无疑问,斯大林模式下的制度安排必然表现为制度供给的过剩。<sup>①</sup>这突出地表现在几个方面:

1. 党政机构重叠,部门林立。在苏联,管理国家事务的机构包括党的机关和政府机关。但是,由于没有厘清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党取得了对国家的全面控制,党包揽了国家几乎一切大小事务,党成为一个全能型、官僚型、行政化的党。因此,有学者指出:苏共“名义上是政党,实质上是国家政权组织”。<sup>②</sup>另一方面,从机构设置上看,表现为党政机构的直接结合。列宁曾强调指出“任何国家机关不经党中央指示都不得解决任何重大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sup>③</sup>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许多重大问题都是由党中央直接决策,直接组织实施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党政机关同构、以党代政的客观事实。在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上,党中央机构就是按照生产原则进行改组的。按照这一原则,党中央设立了农业部、工业部、运输部、计划财政贸易部等专门负责生产业务的职能部门。<sup>④</sup>这些部门的职能大都和政府相应部门的职能直接对口,相互对应。党的官僚化和行政化不仅使得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处于不尴不尬的境地,而且也形成了党政机构重叠、部门林立的客观事实。这种状况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可以说达到了高峰。1986年召开的二十七大上,苏共提出了“根本改革”的指导思想,并进行了又一次的对国家行政机构改革,但是这次改革也没有改变党中央机构设置的原则。

2. 党政机构臃肿,干部队伍庞大。斯大林在1953年5月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的著名口号,虽然有其特定的内涵,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也确实反映了苏联的社会实际。因为苏联这样一个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不仅要集中各种资源,而且还要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与管理工作,这自然需要大量的干部。这样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国家管理机构日益膨胀。这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最为典型。勃列日涅夫时期庞大的国家管理机构的特点是:(1)机构多。据1982年的统计,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最后一年,部级单位(部和委员会)和部长会议直属单位有110个。(2)副职多。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各个部的副部长多达11—12人。(3)领导人多。一些部务委员多达30人,在管理人员中,各种“长”字号的,即正副首长、正副主任,占总人数的31%。这就是说,平均2个下属人员就有1个领导人。(4)干部队伍庞大。尽管一再宣布精简编制,人员却在继续增加。1975—1983年,全苏管理机构人员就增加了300万人,总计有2100万人,约占总人口(2.72亿)的8%。<sup>⑤</sup>

3. 党和政府机关不仅进行着国家事务的宏观管理,而且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着微观而具体的管理;不仅借助于计划经济体制实行着经济的、物质的控制,而且还实行着对人的思想的调控。列宁自己也承认:由于党中央和政治局“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它不仅解决着一系列大政方针问题,而且“整天忙于行政工作”,有些具体的小事情都搬到政治局去解决。<sup>⑥</sup>像是否增加运粮的车皮和存放粮食的库房,干部休养所的归属问题,是否允许出售外国书籍,谁出国购买机车问题,甚至是否让某教授出国并拨款给他等十分细小的问题都要由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定夺。<sup>⑦</sup>我们从卡冈诺维奇下面的一段话中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苏联制度供给的过剩。他说“中央委员会不仅花时间来指导国际政策问题、国防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而且还同时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课本、图书馆、文学、剧院、电影院;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唱片的生产、肥皂的质量等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也就在这里,就是说,要分出主

①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针对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评论道“苏联体系在斯大林手中变成了一个独断专制政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不但要全面整体地控制其人民生活、思想的各个层面。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但凡可以之处,也完全受制于整体制度的目标与成就。至于目标为何,成就何在,则由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界定指令。”(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582页。)

② 潘德礼《论苏联剧变的思想政治根源》,《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5期。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④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四分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8页。

⑤ 刘克明、金挥主编《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54—555页。

⑥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6页。

⑦ 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7页。

要战线,全力以赴,同时又要注意到整个战场,任何一个地段都要观察到。”<sup>①</sup>如此微观而具体的管理,不能不说是制度供给的过剩。关于这方面的事例非常之多,在此略举两例。例一,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在1946年夏、秋分别通过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善保存、不许浪费、盗窃粮食、防止粮食霉变的决定》和《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完善保存的决定》,<sup>②</sup>我们从这两个决定的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苏联政权机关从事微观而具体管理活动的内容。例二,在1947年3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苏联各个部和中央部门设立荣誉法庭》的决定,这一决定的目的是培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忠于苏维埃国家利益,而其实质则是加强对他们的精神控制。<sup>③</sup>

## 二、制度供给过剩的政治后果

苏联制度供给的过剩造成的后果是全方位的,例如,在经济领域,由于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看作是命令经济,因而在其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引发政治权力的寻租性腐败、缺乏竞争和创新、效率低下;在思想文化领域,由于也和经济领域一样实行着“国有化”,人们的思想是由国家来“配给”的,因而也必然会引发思想的僵化、教条主义之风泛滥。但是,在这里,笔者只想从政治领域来考察制度供给过剩在苏联所产生的后果,即政治衰朽。

1. 制度运转失灵,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党政机构重叠,部门林立,必然造成部门之间的相互扯皮和内耗,人浮于事,责任意识缺乏,办事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作风盛行。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由于强调干部的稳定性、继承性,结果是干部只上不下,管理机构增加,人员膨胀。而且由于干部实际上是上级委任的,因而他们自然养成了只对上级负责,并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而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化甚至消失。同时,由于在这庞大的官员队伍当中,必然也会有一些不称职的人,他们更是深谙官场秘诀,在官僚体系当中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sup>④</sup>这更加重了苏联官场生态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运行实际上只能意味着制度的空转。与此同时,由于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官员已形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的自私和保守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处于空转状态的制度的僵化。又如,党和政府机关不仅对国家事务,而且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管得太多”,其最终的结果则是“管不了,管不好”,这反映出制度的低效甚至无效。因此,再多的制度供给都是等于无,因而也等于制度供给的不足。

2. 干预政治的人治悖论。苏联制度供给过剩意味着国家干预过多,因而它表现出强烈的干预政治的色彩。在苏联政治制度的建构中,一直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最后只剩下了集中,而且这种集中按照托洛茨基的说法是“党的组织取代了党本身,中央委员会取代了党的组织,而最终独裁者取代了中央委员会。”<sup>⑤</sup>分明地,这种高度集中的制度安排为几个人或一个人的干预政治创造了条件,以至于几个人或一个人成为政治的化身。也因此,由于高度集中的权力由几个人或一个人来掌握和处分,过多的制度供给并没有向政治制度化转化的可能,却导致了人治的结果。可以看到,苏联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活都带有强烈的人格化色彩,特别是具体的决策问题上更是如此。这并不是说,领导人不能有个人的意志,而是说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具有了决定一切的能力,一切问题都要以领导人是否同意、是否喜欢、是否高兴为转移,领导人的言论成为裁决一切问题的最终依据,甚至具有了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不正当地位。各个时期的领导人的小册子的大量发行,领导人的语录满天飞,都是人治的表现。

① 卡冈诺维奇《从党的第十六次至第十七次代表大会》,1934年,转引自阿·阿夫托尔哈诺夫《权力学》(上册),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5-346页。

②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③ 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④ 美国学者科兹和威尔针对苏联党政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殊主义道德取向一针见血地指出“除了少数几个极高级的领导外,他们所有的人都完全依附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并最终依附于党。要想保住现有的位置,要想有所提升,就得要有上级党组织的嘉许才行。”一旦失宠,在斯大林时期即意味着坐牢或杀头。而在斯大林之后,“虽然不再意味着坐牢或杀头,但也要在失去位置的同时,失去物质优惠,失去权力”。(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⑤ 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04页。

人治是由于领导人掌握过多的权力造成的,在他们可以率性而为的同时,却要求人们对他们的政治忠诚。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发现,在一切领域中,尤其是在分配领域中,基本上是按照一种和普遍主义原则相反的特殊主义的“道德准则”而进行活动的。对此,托洛茨基的一段话可谓经典,他说“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国家里,反抗就等于慢慢地饿死。‘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旧的原则,已由‘不服从者不得食’这个新的原则所代替。”<sup>①</sup>因此,在政治忠诚原则的规制之下,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政治道德化、道德政治化的非常态的政治现象。实际上,苏联这种政治与道德合一的现象是一种政治上的返祖现象,是由社会主义政治向封建主义政治的回归。无论站在何种立场、坚持何种价值,人治现象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与道德的合一的现象,都是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相背离的。

3. 民众的政治冷漠。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应该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从苏联的政治现实来看,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拥有在理论上所宣扬的那种自由思考和行动的权力。对此,美国学者法伊格曾指出“在苏联模式的社会里,国家控制、国家所有、国家干预达到无处不在的地步,从而,几乎每一步都需要国家官员的批准和合作。”<sup>②</sup>其言外之意就是,公民个人的任何行动几乎都是国家作出的安排,都受到了国家意志的控制和支配。戈尔巴乔夫把这种情况称作是“苏维埃生活方式”。他指出:苏维埃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本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情,一切都需由当局代他们决定”。<sup>③</sup>

然而,国家对民众的管制、干预较多,从长远的角度看,势必会造成民众的政治冷漠。因为,就苏联民众来说,高度集中的体制已经变成了一种异己的强制性力量,国家政治生活在实际上已经和他们毫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拥有以·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即拥有“去做什么”的权力,却没有“不去做什么”的自由,这样,民众的自主性便被抹杀了。而自主性的丧失则意味着政治冷漠的形成。戈尔巴乔夫曾指出,具有强制特征的苏维埃生活方式的结果将必然会“转化为社会性的依附心理和社会性的冷漠态度”。<sup>④</sup>美国学者悉尼·胡克曾就民众的政治冷漠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提出忠告“在被统治者觉得他们对政府无关重要的地方,结果就会产生漠不关心的情绪。而政治上的漠不关心就可以被称作民主的枯萎。穆勒说得好,‘感情的滋养料是行动……让一个人对他的国家无事可做,他就将对国家毫不关心’。”<sup>⑤</sup>由此出发,我们便可以弄清楚:为什么在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时,民众表现出极度的冷漠。

4. 政治合法性的下降。苏联制度供给过剩非但没有提升其政治的合法性,反而导致其合法性的下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解释:

(1) 在苏联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且一般认为,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得以形成。这样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专权擅政、贪污腐化,完全成为了一个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服务的自利集团。毫无疑问,由这样的官僚队伍来领导国家是无法获得民众的合法性认同和支持的。列宁早在1921年10月就曾把“贪污受贿”看作是“政治教育”工作的“三大敌人”之一,他说“只要有贪污受贿这种现象,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搞政治的门径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搞政治,因为一切措施都会落空,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在容许贪污受贿和此风盛行的条件下,实施法律只会产生更坏的结果。”<sup>⑥</sup>在这里,列宁的思维逻辑是:政治教育工作的目的是为苏维埃政权进行合法性辩护,进而引导民众认同和支持苏维埃政权,然而,贪污受贿现象的存在却在侵蚀着苏

① 转引自F·A·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② 艾德加·法伊格编著《地下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页。

③ 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④ 米·谢·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⑤ 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7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1页。

维埃政权的合法性。

(2) 苏联制度供给过剩反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领域,则表现为“强国家—弱社会”的客观事实,而国家权力过于强大,在某种程度上又表现为公共权力的不可约束性。在苏联,公共权力的不可约束性受惠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执掌政权的苏联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这个先锋队是以人民利益为重,并会自觉为人民谋幸福的,因而它没有必要受到约束,有约束反而会束缚为人民服务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在理论上是合理的,然而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不受约束和监督导致了政治上的不负责任的“乱作为”现象,即使官员们犯了错误,只要目的高尚,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所谓“目的高尚”便成了免责的通行证。这在表面上保护了官员和公共权力,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实际上在削弱着政权的合法性。法国学者德尼·里歇的观点即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政治权力免受惩罚的情形,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不仅仅是领导者,而且同样是整个政治机构失去了它们的信誉。如果政治体制过分地保护了它的领导人,它就只能使自己更加趋向于脆弱”。<sup>①</sup>

### 三、结语

在苏联 70 余年的历史中,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改变、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看,制度供给过剩的苏联没有正确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苏联未能处理好政治与经济、文化、社会等其他领域之间的关系。虽然制度供给过剩主要是政治领域的问题,但是由于苏联主要是一个政治性的国家,政治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因而政治领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那么就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生活系统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过剩的制度也就成为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的阻碍性力量。二是苏联未能处理好党群、官民关系。制度的意义在于其所具有的普遍价值,然而,苏联的制度却染上了特殊主义色彩,它主要是用来约束、管理民众的。管得太多太滥,必然损害了民众的自主性、创造性和对制度的忠诚;管了又管不好,则必然有损于政府和官员的权威和形象,有损于制度的感召力、凝聚力。

## 党群关系的嬗变与苏联解体

韩晓燕

(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党校,上海 201100)

20 年来,我国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共产党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一观点强调了党群关系的解体是苏联解体的前奏。<sup>②</sup> 笔者主要基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党群关系对这一观点作进一步探讨。

### 一、苏共党群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

所谓的党群关系,宏观上讲,就是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微观上讲,是指政党与组成社会的各个团体、公民、选民以及自治性组织的关系。党群关系是世界上所有政党都必须面对和高度关注的内容。苏共党群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方兴未艾到和谐相处、矛盾凸显到分崩离析、极度恶化的过程。

<sup>①</sup> 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4 页。

<sup>②</sup>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南方周末》1991-08-17。